

编者按 国际政治一向被视作以权力、利益为核心的领域,与强调感性、追求美的艺术格格不入。实际上,艺术作为观念的反映,始终在表达和建构国际政治。自21世纪初“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口号提出以来,艺术与国际政治这一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国际学界关于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现状如何?中国学者取得怎样的进展,还存在哪些不足,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韩善聪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聃副教授。陈玉聃副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艺术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思想史,著有《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等。

21世纪以来艺术与国际 政治研究的发展

——陈玉聃副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韩善聪(以下简称“韩”):您认为,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包含哪些内容,在学科中有怎样的定位?

陈玉聃(以下简称“陈”):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也是作者个人的情感表现,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多种门类。^①艺术既然反映和表达着社会现实,国际政治当然也并不例外。从古至今,在国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0页。

际政治的历史中,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位者。美国学者、外交家阿恩特(Richard T. Arndt)认为,文化外交自青铜时代起便已有所记载,其兴起与语言的发展相伴而生。^① 由此而论,艺术同国际政治的交织则应更早,因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实先于语言而产生。可以说,自国家诞生伊始,艺术便勾连在国家间政治之中;不论东方西方,国际关系史与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门类在内的广义的艺术史,都彼此呼应、可相对照。

毫无疑问,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是一个交叉领域:一方面,它固然是艺术(尤其是艺术史和艺术哲学)与国际政治两个学科的交叉;另一方面,它又与国际政治中某些既有的研究方向(如文化外交、“软实力”理论等)有所交叉。因此,需要通过比较,厘清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内涵与外延。其一,从研究层次而言,文化外交等研究领域所关注的,主要是单位(国家)层面的对外政策;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不囿于此,既关注单位,也关注体系,两者的区别类似于外交学和国际政治学之差别;其二,从研究对象而言,文化外交等研究领域包含哲学观念、思想传统等文化中的“理性”部分,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专注于以“感性”为基本表达方式的各种艺术作品;其三,从研究旨趣而言,文化外交等研究领域虽然也时常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但后者往往只是依附和服务于外交、权力等传统国际政治概念的工具性变量;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则赋予了艺术独立的意义和主体性地位,其着眼点是艺术对政治现实的“表征”(representation),即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对国际政治的感知和表达。

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往往也被冠以国际政治研究的“美学转向”(aesthetic turn)之名。“aesthetics”(美学)一词来自古希腊语的“aisthetikos”,即通过感官(sense)所获得的感知(perception)。由于以艺术的“表征”本身为关注的核心,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取向,便不是“模仿”(mimetic),也就是说,重点不在于作品是否及如何真实地反映事物的真相、忠实地传递行为者的信号和意图,而是以承认作品和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为基本立足点的“美学”取向。^② 由此出发,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表达,主要关注的是艺术作品中的国际政治观念。这种表达可能与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如《山海经》或者欧洲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但其意义不在于真实与否,因为涉及国际政治的艺术作品事实上构成了一部以感性方式而非理性化的哲学或史学方式呈现的国际政治思想史,这可以帮助人们认

^① Richard T. Arndt, *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Inc., 2005, p. 1.

^②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21.

识丰富多彩而又不断流变的国际政治观念,甚而引发对国际政治的理论反思;二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构建,即艺术作品对国际政治的表达,如何影响受众的认知,并通过后者的行为,构建国际政治的现实。这里的受众可能是普通大众,也可能是领导者和外交家,这种影响可能符合艺术创作者的本意,也可能与作者无涉。对此种“构建”的研究,正呼应了著名史学家科林武德的论断:“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①

韩:您能否介绍一下艺术议题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缘起?

陈:尽管在国家间政治的实践中,艺术的创作和传播始终贯穿其中,几乎一切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都伴随着各种艺术作品的表达和建构,但直至 21 世纪初,艺术与国际政治才成为一个独立和自觉的研究领域。

20 世纪前,艺术在政治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是政治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主题。东西方政治哲人在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说中,时而会涉及战争、秩序等国家间政治的内容。例如,儒家将乐和诗,视为礼的重要形式,直接与天下的政治秩序相关,令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正是“八佾舞于庭”这样的国家间等级秩序的崩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音乐对公民的德性影响重大,尤其是柏拉图,他提出在当时流行的六种调式中,只有弗里其亚和多利亚两种调式应当保留,因它们分别适于国家及其公民的“祀”与“戎”。^② 在国际政治自身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古代和近代哲人们的零星思考,只能被视为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史前史”,但其思想深度为当今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土壤。

20 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科逐渐成形。在此背景下,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初步有了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国际政治学科内对艺术议题的研究,后者则泛指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③ 就狭义角度而言,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理论的奠基者们早已对此议题有所涉及。“理想主义”学派强调启蒙主义和人文精神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积极作用,对文化艺术自然重视,其代表人物、曾为古典学者的齐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委会的首任主席,并围绕着以“在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为宗旨的教科文组织应侧重艺术还是科

① [英]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03 页。

②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07—111 页(398D—400D)。

③ 此处的广义、狭义之分,参考了徐以骅教授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分类。参见徐以骅:《21 世纪以来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54 页。

学的问题,与其继任者、生物学家赫胥黎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路线冲突。^① 20世纪30—40年代,现实主义学派的两位奠基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和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也在他们各自里程碑式的著作《二十年危机》和《国家间政治》中对艺术与国际政治有所论述。卡尔分析了当时以“电台、电影、大众报刊这类方式”为主的宣传手段,来说明“支配舆论的权力”;摩根索则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开始,对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梳理和评价。^② 然而,直至20世纪末,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仍未真正产生,这不仅是因为专门研究极为罕见、处于边缘地位,更是因为国际政治学者提及艺术的少许文字,往往并非以艺术本身为关注点,而是对各自既有理论的修饰说明,甚至奈的“软实力说”也并不例外。需要提及的是耶鲁大学政治学者、苏联问题专家弗里德里克·巴洪(Frederick Barghoorn),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专注研究苏联的文化外交、对外宣传和对美国的想象,论著颇多,有大量关于艺术与外交、艺术与政治的分析。^③

就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而言,冷战的爆发及其意识形态对抗的性质,催生了不少以文化冷战为主题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大多来自艺术史学者。^④ 这些作品往往聚焦于某一具体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等,长于专门资料的整理,但通常理论框架欠缺,与国际政治学科也很少有对话。它们为此后文艺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和研究素材。

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而言,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在20世纪只是处于萌芽阶段。这一研究领域真正形成的标志是国际关系学科知名期刊《千年》在2001年12月的专辑“世界政治中的图像和叙事”(Images and Narratives in World Politics),该专辑邀请了多位作者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夏威夷大学教授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J. Shapiro)、悉尼大学教授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娜·

① John Toye and Richard Toye, "One World, Two Cultures? Alfred Zimmern, Julian Huxley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UNESCO," *History*, Vol.95, Issue 319, 2010, pp. 308-331.

② 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pp. 40-42.

③ 巴洪因为在1963年被苏联以间谍名义逮捕并引起两国外交斗争而名噪一时,但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的学术领域,目前他的名字和研究似乎很少被提起。他的主要作品包括:Frederick C. Barghoorn, *The Soviet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0; Frederick C. Barghoorn, *Soviet Cultural Offensive: The Role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Frederick C.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④ Naima Prevots, *Dance for Export: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Cold War*, New England: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等学者撰稿,内容涵盖文学、图像、影视、音乐等多方面,还以 20 余篇书评的形式,综合介绍了当时值得关注的研究著作,该专辑的刊发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其中,昆士兰大学教授罗兰·布莱克(Roland Bleiker)《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一文发挥了奠基性作用,确立了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导向和理论自觉。^①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枝散叶,蓬勃发展起来,目前已有相当丰富的著作和文章,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屡见专辑,在顶尖出版社也不乏以此为主题的丛书。^②2017 年,《千年》杂志又以“美学转向 15 年”(The Aesthetic Turn at 15)为名,回顾总结这一领域的发展。

韩:您认为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蓬勃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陈:21 世纪以来,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蓬勃发展有以下几个相互交织的原因:

第一,国际政治现实和观念的演变。马丁·怀特在论及为何有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史,却无相对应的国际政治的思想传统(international theory)时曾总结道:“政治理论……是关于良善生活的理论,国际理论则是关于生存的理论。”^③以此类比,艺术更是被认为关乎理想之美的领域而与国际政治及其理论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思想家在涉及这一主题的零星论述中,常以伦理为导向。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越发积极,有别于古典艺术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也渐趋主流,这使得艺术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交融渗透愈发普遍,也使研究者开始对国际政治的外延有了新的理解。2005 年,由穆罕穆德漫画引发了一场始自丹麦、波及世界的冲突,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关系学领军人物琳娜·汉森(Lene Hansen)由此而开始关注图像与国际安全议题。

第二,国际政治理论自身的发展。21 世纪初期,国际关系学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三大理论鼎足之势已成,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以理性和利益为核心。在国际政治研究的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等诸方面是否能有整体性的理论进展,而非只是小修小补?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是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引入的,并非只是一个新鲜议题。这也就是该领域的奠基者们如勒博(Richard Ned Lebow)、西尔维斯特、布朗、夏皮罗、德里安等,都同时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家的原因,而所谓“美学”路径也从一开始就指

^① Roland Bleiker, “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3, 2001, pp. 509-533.

^② 比较重要的期刊专辑如“Art, Politics, Purpo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5, No.4, 2009;丛书如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流行文化与世界政治”(Popular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丛书。

^③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 No.1, 1960, p. 48.

的是国际政治理论——而非研究领域——的转向。

第三,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20世纪以来,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偏爱“高级政治”的历史研究传统受到质疑和挑战,由年鉴学派开创的生活史、文化史、心态史潮流开始兴起,这使国际政治研究转向有了效法的对象。同时,20世纪欧陆哲学家们对美学和艺术哲学的重视,也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学者对艺术的研究,阿多诺等思想家的名字时常出现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著述中,法国哲学家朗西埃“作为政治的美学”概念也被“美学转向”的研究者们奉为圭臬。^①

韩:国际学界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迄今取得哪些成绩?

陈:艺术与国际政治自21世纪初成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以来,取得丰硕成果和并产生广泛影响,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

首先,国际学界的研究主题广泛而深入。可以说,它涵盖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领域,而在每个大的门类之下,各种次级领域也往往都有专门研究。例如,同样是美术,西尔维斯特的著作专注于博物馆中自古典至现代的各种藏品,汉森多篇研究论文则围绕着当代媒体上的各种卡通漫画;同样是文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托尼·厄斯金(Toni Erskine)和勒博主编的《悲剧与国际关系》以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德等国的经典戏剧为主题,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尤塔·韦尔德斯(Jutta Weldes)主编的《探寻新世界:科幻作品与世界政治之间的联系》以科幻小说为对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伊弗·诺依曼(Iver B. Neumann)和乔治城大学副教授丹尼尔·内克松(Daniel H. Nexon)主编的《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以流行文学为关注点;同样是影视,夏皮罗和萨塞克斯大学辛西娅·韦伯(Cynthia Weber)教授在电影与国际政治领域已有大量著述,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蒙斯特(Rens Van Munster)等人的《记录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非虚构电影的批判性指南》则将纪录片也纳入其中。在此之外,一些更为大胆和前卫的议题也已有了探索性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英国雷丁大学副教授安德烈亚斯·本克(Andreas Behnke)主编的《时尚的国际政治》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劳拉·谢泼德(Laura J. Shepherd)等人主

^① Aida A. Hozic, "Introduction: The Aesthetic Turn at 15 (Legacies, Limits and Prospects)," *Mi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5, No.2, 2017, p. 203.

编的《在数码时代理解流行文化和世界政治》。^①

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在如此宽广的领域中精耕细作,一方面,因为这一领域内国际政治学者往往也精擅艺术。如西尔维斯特受家庭影响,自幼对美术充满兴趣;布莱克雅好诗歌——这也是他的代表作《美学与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且练习长笛、钢琴和摄影,并将它们视为自己美学研究的“田野调查”;^②韦伯在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之余,还是专业的影视制作人;夏皮罗曾经担任国际电影节的评委。^③另一方面,狭义和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即国际政治学者对此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近十年愈发融合,两者间的交流对话促进了这一交叉领域的蓬勃发展。以两项较新的学术成果为例,由韦尔德斯等国际政治学者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流行文化与世界政治”丛书至今已有十余本,在这一标志性的研究系列中,各书的著者和编者既包括国际政治学者,又不乏来自传媒、文学等领域的学人。^④另一大学术出版社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的“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丛书”中的最新一部论文集《国际关系、音乐与外交》,两位主编其中之一是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欧洲国际研究协会(EISA)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拉梅尔(Frédéric Ramel),另一位则是巴黎第三大学音乐学助理教授塞西尔·普雷沃-托马斯(Cécile Prévost-Thomas),以音乐社会学和音乐史见长,文集作者也均来自于国际政治和音乐两个学科。^⑤

其次,国际学界的研究具有丰富的议题联结性。艺术与国际政治并非是

① Christine Sylvester, *Art/museu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re We Least Expect It*,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Lene Hansen, “How Images Make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cons and the Case of Abu Ghraib,”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1, No.2, 2015; Lene Hansen, “Theorizing the Image for Security Studies: Visual Securitization and the Muhammad Cartoon Cri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1, 2011; Lene Hansen, “The Politics of Securitization and the Muhammad Cartoon Crisis: A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Security Dialogue*, Vol.42, No.4-5, 2011; Toni Erskine and Richard Lebow, eds., *Traged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Jutta Weldes, ed., *To Seek out New Worlds: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Daniel H. Nexon and Iver B. Neumann, eds., *Harry Pott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Michael J. Shapiro, *Cinematic Geopolitics*,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Michael J. Shapiro, “Film and World Politics,” in Federica Caso and Caitlin Hamilton, eds., *Popular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Bristol: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5; Cynthia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10; Cynthia Weber, “I Am an American”: *Filming the Fear of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Rens Van Munster and Casper Sylvest, eds., *Documenting World Politics: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IR and Non-Fiction Film*,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Andreas Behnk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Fashion: Being Fab in a Dangerous World*,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Laura J. Shepherd, Caitlin Hamilto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Digital Age*,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②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 226.

③ Michael J. Shapiro, *Cinematic Geopolitics*, p. 1.

④ 丛书介绍参见出版社网页: <https://www.routledge.com/Popular-Culture-and-World-Politics/book-series/PCWP>, 2018-09-11.

⑤ Frédéric Ramel and Cécile Prévost-Thoma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sic, and Diplomacy: Sounds and Voic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一个封闭的领域,因其以艺术作品中的感官、感知为研究核心,它对国际政治学科中其他一些重要议题甚至是学科领域有积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如前所述,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表达,二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建构。就其表达而言,由于艺术作品的感性特征,它与人类的情感有直接关系。因此,国际政治中的情感议题,与艺术研究领域有非常密切的交互联系。艺术与国际政治的两位领军学者布莱克和西尔维斯特,都在重要学术刊物上组织过情感议题的专辑。^① 汉森教授在哥本哈根大学主持的“图像与国际安全”(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研究项目,三个子项目之一就是“情感与军事冲突”(Emotion and Military Conflict)。就艺术对国际政治的建构而言,它与认同(identity)议题有最为直接的关联——不论是民族、国家认同,还是宗教、阶级、性别等认同,都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内容和研究对象,也都在很大程度上由音乐、文学、仪式等艺术形式所构建。例如,布莱克在《美学与世界政治》一书中的最后一章,就通过韩国诗人高银(Ko Un)对政治认同进行探讨;2002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拉贾拉姆(Prem Kumar Rajaram)的博士论文,主题是通过美学政治反思国际关系中的难民身份;也有学者通过音乐、舞蹈,对国际政治中的性别认同进行研究。^②

若将艺术按照流行和古典进行两分,那么,对它们的研究就分别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思想史这两个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互动。在当代社会中,流行文化已高度资本化、产业化,其生产、传播和消费往往跨越了国家边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一领域……流行文化都已然在国际政治经济实践中嵌入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显露”。^③ 在十余年前对流行文化符号“哈利·波特”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这部作品的全球流行背后是传媒产业的巨大市场力量。^④ 在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流行文化与世界

① Christine Sylvester, “Forum: Emotion and the Feminist IR Resear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3, No.4, 2011, pp. 687-708; Roland Bleiker, “Forum: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6, No.3, 2014, pp. 490-594.

②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p. 152-70; Prem Kumar Rajaram, *Exile and Desire: Refugees, Aesthetics, and the Territorial Borde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LSE, 2002; Sonja van Wichelen, “‘My Dance Immoral? Alhamdulillah No!’ Dangut Music and Gender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in M. I. Franklin, ed., *Resou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Culture, Music, an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161-177.

③ Jutta Weldes and Christina Rowley, “So, How Does Popular Culture Relate to World Politic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ril 29, 2015, https://www.e-ir.info/2015/04/29/so-how-does-popular-culture-relate-to-world-politics/#_ftn15, 2018-09-11.

④ Patricia M. Goff, “Producing Harry Potter: Why the Medium Is Still the Message,” in Daniel H. Nexon and Iver B. Neumann, eds., *Harry Pott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政治”丛书中,有两本的标题直接与“政治经济学”相关,^①有学者甚至提出“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② 音乐、绘画、文学等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则因其对同时代人们国际政治观、世界观的深刻反映而为学者所重视,作为感性的思想史,可与抽象、思辨的哲人的思想史相印证。从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言,政治思想史学者对艺术已着墨甚多,其中不乏与国际政治主题相通之处。如剑桥学派代表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2017年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中,有一讲便以“霍布斯:描绘国家”为题,借助图像研究展示霍布斯的国家构想和主权理论;斯坦福大学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在其《歌剧与观念》一书中,也对19世纪欧洲的国际政治观念有所涉及。^③ 从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言,国际政治学科内的思想史学者,如布朗、卡迪夫大学教授戴维·鲍彻(David Boucher)等,往往也在艺术研究领域有所著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精通多国语言,对诗歌、音乐都颇有造诣的勒博。他撰写的《认同的政治与伦理》一书,自荷马史诗、维吉尔诗歌、莫扎特歌剧至近代戏剧、宗教小说,通过艺术构筑起一部宏大的认同观念史;他参与主编的论文集《悲剧与国际关系》,试图通过古希腊、莎士比亚和其他传世悲剧作品透视国际政治:“借由赏析悲剧,我们能增长见识,此种见识系于今日之世界,正如系于那催生了这一题材的特殊环境”。^④

再次,国际学界的研究有明确的理论导向。如前所述,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从最初就有着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的抱负。艺术是为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轻视的“低级政治”,艺术的基本特征“感性”又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理性”相对立,因此,艺术议题天然地与关注边缘和弱势、强调批判和挑战的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同盟性。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中,女性主义(Feminism)理论家比例之高令人印象深刻,西尔维斯特、韦伯、汉森等学者都同时在两个领域成就卓著,被视为旗手,甚至作为男性学者的布莱克对女性主义也有所研究。其余如夏皮罗和德里安等学者是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勒博则自视为真正的建构主义者——与主流建构主义者不同,与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流理论家更是相去甚远。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

① Penny Griffin, *Popular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Death of Feminism: Why Women Are in Refrigerators and Other Stories*,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Nathan Farrell,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lebrity Activism*, Abingdon: Routledge, 2018.

② Claes Belfrage and Earl Gammon, “Aesthetic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 Vol.45, No.2, pp. 223-232.

③ 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周彬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Richard Ned Lebow,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Identity: In Search of Oursel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oni Erskine and Richard Ned Lebow,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ragedy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oni Erskine and Richard Ned Lebow, eds., *Traged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 p. 8.

的研究者往往直截了当地对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提出异议。^①若将视野扩大到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还会发现,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研究,揭示和批判西方世界的世界政治观念,如著名思想家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对简·奥斯汀和吉伯林小说的解读。^②

具体而言,在国际政治学科中,由艺术而通达理论,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揭示、批判。如韦伯的《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性的介绍》一书,用电影分别揭示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迷思”,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C. Williams)解读摩根索政治思想的《美学现实主义》一文也发人深思;^③二是补充、发展。例如,汉森的“图像与国际安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图像代替“话语”,发展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三是冲击、挑战。同样试图以“美学转向”颠覆主流理论或者至少另辟蹊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又各有侧重。相对而言,夏皮罗从康德和朗西埃的美学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强调从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处解放,实现本体论的转向;^④布莱克更注重艺术“表征”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认知论转向;西尔维斯特则试图证明“以艺术为基础的方法论”对国际政治这个“传统上无视艺术和人文知识”的学科的价值。^⑤

韩:目前,国际学界的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

陈:首先,尽管国外学者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却存在重要缺憾: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很少涉及。布莱克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曾以中国先秦哲学思想批评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其中通过庄周梦蝶等艺术作品对认知论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但在“美学转向”之后却没有更多延伸。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大多围绕着欧美艺术展开,即使在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领域,有史学家或汉学家零星涉及中国议题——如普拉特(Keith Pratt)对宋徽宗音乐外交的研究,他们通常也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不为这一领域的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彼此绝缘。相比之下,以西方世界为对象的类似研究,如著名外交史学者杰西卡·吉璠-黑希特(Jessica

①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 20; Jutta Weldes and Christina Rowley, “So, How Does Popular Culture Relate to World Politic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ril 29, 2015, https://www.e-ir.info/2015/04/29/so-how-does-popular-culture-relate-to-world-politics/#_ftn15, 2018-09-11.

② [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③ Cynthia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ichael C. Williams, “Aesthetic Realism,” in Brian C. Schmidt and Nicolas Guilhot, eds., *Historiographical Invest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51-78.

④ Michael J. Shapiro, “Michael J. Shapiro on Pictures, Paintings, Power, an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alks* 36, <http://www.theory-talks.org/2010/02/theory-talk-36.html>, 2018-09-11; Michael J. Shapiro, *Cinematic Geopolitics*, pp. 94-95.

⑤ “Editor’s Interview with Christine Sylvester,” *Journal of Narrative Politics*, Vol.2, No.2, 2016, p. 96.

Gienow-Hecht)关于德美关系的《声音外交》一书,^①在学界的影响更为重大。

相较于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和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存在这样的研究空白显然与之极不相称。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与艺术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许不无干系。以音乐为例,在欧美大学中的相关院系中,西方音乐居于教学、研究和演奏的绝对主导地位,很少有中国音乐的身影,即使有,也只不过在本已居于边缘地位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中占据极小部分内容。其他艺术门类也大抵如此。因而,不论是国际政治学者对艺术的兼涉,还是艺术领域的学者对国际政治问题的介入,都难以产生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兴趣和成果。事实上,布莱克在“美学转向”15年的反思中,也已经非常明确地对美学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和唯西方思想独尊的现象表示担忧,视为对这一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

其次,虽然西方学界有着明确的理论导向,使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厚重坚实,意义深刻,但也不难发现,在通过艺术议题对理论和现实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仍然没有也无法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正是基于主流理论发展至瓶颈后的反动;而夏皮罗更是明确表示,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只是前康德式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应当以康德和后康德式的思维取而代之,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只需依照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便可。若如此,“美学转向”在理论上的创造性和先锋性可能会愈发消解,更何况,就目前研究来说,它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似乎类似,都长于批判而短于建构。

韩: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方面,国内学界发展状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中国自古以礼乐立国,艺术在中国人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政治观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宋徽宗在对高丽的音乐外交中,曾在国书中写道:“古之诸侯教尊德盛,赏之以乐……夫移风易俗莫善于此,往祇厥命御于邦国,虽疆殊壤绝同底大和,不其美欤。”^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以越剧电影《梁祝》,也传为美谈。然而,学术意义上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直至近十年方始兴起。

就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言,目前笔者所见国内学者最早的相关文献,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章远副研究员的论文《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审美意向》,其中,便引用布莱克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一文。^③ 2011

^①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Sound Diplomacy: Music and Emotion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1850-192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② 宫宏宇:《赵佶的音乐外交与宋代音乐之东传》,《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26页。

^③ 章远:《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审美意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53—57页。2012年,章远还发表了另一篇以美学为主题的文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美学观照》,《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21—26页。

年,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的文章《“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从方法论角度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反思。^① 陈玉聃在2011、2012年发表的两篇论文《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是国内学界较早对某个艺术门类进行的专门研究。^② 2013年和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的《文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院郭小聪教授的《守夜人与夜莺》相继出版,两位学者都兼具文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教育和研究背景,这两部著作出版进一步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守夜人与夜莺》一书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哲学思考。^③ 陈玉聃2015年发表的《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与外交学院博士生何伟2016年发表的《图像与国际安全建构》等数篇论文,开始自觉地对艺术与国际政治领域进行理论建构并与国际学界研究接轨。^④ 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介入其中,使这一领域得到长足发展。

就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言,历史学、比较文学、政治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时而也涉及这一主题。篇幅所限,兹举几例,以证其丰: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对作为图像的地图与中国人之世界和空间想象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张源教授对文学化的帝国叙事与帝国逻各斯诞生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大学侯铁军副教授对瓷器与大英帝国话语政治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对视觉艺术与中国认同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林国华教授对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作品与古代西方正义战争的专题讨论教学。^⑤

回顾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对其成就或可做如下总结。首先,议题逐渐拓展、日益多元。即使只论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目前也已涵盖音乐、文学、影视、美术、服饰、动漫等几乎所有新旧艺术种类,不仅

① 时殷弘:《“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

② 陈玉聃:《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文化视角》,《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陈玉聃:《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该领域中还有曾琳智以音乐外交为主题发表的多篇文章及完成的博士论文,参见曾琳智:《音乐在美国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曾琳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探究:以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为例》,《国际观察》2013年第3期;曾琳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曾琳智:《浅谈音乐在中国对外传播中的角色:以中国爱乐乐团(2000—2016年)海外演出为例》,《对外传播》2017年6月。

③ 林精华:《文学国际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郭小聪:《守夜人与夜莺: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④ 陈玉聃:《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陈玉聃:《诗与思: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视》,《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8期;何伟:《图像与国际安全建构:以安全化研究为视角》,《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何伟:《图像与对外政策:艾兰·库尔迪和英国关于欧洲难民危机辩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何伟:《表征与国际政治研究:一种美学的维度》,《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

⑤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

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文汇学人》2015年11月13日;张源:《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1期;侯铁军:《“茶杯中的风波”:瓷器与18世纪大英帝国话语政治》,《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吕新雨:《错位: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叙述与视觉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已发表大量论文,一些博士论文和已出版的专著也关注其中的一些议题。^①

其次,学界相互沟通、交流日多。初时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大多出于兴趣自发研究,很少存在交流。随着研究成果的丰富,大家渐识同道,开始共同组织学术活动,在 2013 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就出现了文艺与国际关系的讨论小组。同时,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之间也开始有所交流,如 2016 年复旦大学主办的“音乐与中国外交”会议和系列讲座、2017 年上海音乐学院主板的“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人与爱国情怀”研讨会,都聚集国际政治学、历史学、音乐等多个门类的学者和艺术家。此外,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国际政治专业也已设置了文化艺术和国际关系的相关课程,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再次,研究由器入道、学理益深。国内学者初期的研究,着眼于议题的开拓,以案例的归纳为主;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国际学界的日益了解,一些学者开始主动地从学科和理论的高度,审视和构建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将它与对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现实的反思相结合,使这一领域具有了自为、自觉的意义。

韩:您认为国内学界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陈:艺术与国际政治在国内仍属小众研究领域,虽已初步成型,仍未完全成熟。

首先,议题虽广泛,研究的深度仍有欠缺。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多数较为泛泛,对具体的时段、项目、作品精细研究尚嫌不足;另一方面,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还很少见,相当一部分文章和书籍只停留在通过艺术作品普及和比附国际关系知识的阶段。

其次,交流虽存在,学术共同体仍未形成。国内尚没有期刊组织过艺术与国际政治的专辑,也没有这一领域的丛书;国内学术会议并不多见,基本是偶一为之,没有规律;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交流更是极少。

再次,学理虽初现,理论自主性仍不显明。目前,国内学界的理论思考大多仅是对国外学者“美学转向”的引介消化,换言之,国内学界目前仍只是依着西方的理论发展脉络,并未跳出这一框架,提出中国的理论主张。

韩: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议题?

^① 除前述文献之外,影视主题有沈旭晖:《国际政治梦工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黄日涵等编著:《国际关系梦工厂:电影与国际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李巍:《〈甄嬛传〉中的国际关系学》,http://www.aisixiang.com/data/83687.html,2018-09-11;赵鸿燕:《外交复合关系的隐喻建构:基于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案例分析》,《国际新闻界》2017 年第 4 期;金茜:《电影在国际关系教学中的应用》,《中国高等教育》2016 年第 20 期;岳圣淞:《电影与国际政治:权力、表象与建构》,《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动漫主题有归泳涛:《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外交评论》2012 年第 6 期;黄明幸:《〈海贼王〉世界中军事秩序的逻辑与未来》,http://www.sohu.com/a/250977393_618422,2018-09-11;服饰主题有董入雷:《服装符号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以 2014 年 APEC 会议领导人服装为例》,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7 年,等等。

陈:结合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中国学者或许在两个方向可以有所突破。

第一,在经验研究中,除进一步做出精细化研究外,应当开始尝试以小见大,由一个具体而微的主题,以艺术的感知和共情为基础,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勾连起来,指向一个宏大世界,也就是说,通过艺术突破以往国际政治研究的某些局限性。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为例,众所周知,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是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称为“西方艺术史上第一组反战图像”^①的版画组画《战争的悲惨与不幸》(Les Misères et les Malheurs de la Guerre),便出自三十年战争中的画家卡洛(Jacques Callot)之手,该组画是因卡洛有感于法军对家乡洛林公国的蹂躏而有此作。两百年后,法国作家都德的代表作《最后一课》,同样聚焦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普法战争背景下,却以对普鲁士侵略和占领的控诉而闻名。那么,这两个作品背后潜藏的观念史的流变,以及作者、民众、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是怎样的?再进一步,《最后一课》在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它在当时和此后,如何不断地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塑造着自民国初年至21世纪民众对国家和国际政治的认知和心态?若有类似研究,那么,艺术与国际政治或许能成为不仅有趣而且深刻的对世界政治的思考维度。

第二,在理论研究中,应当在积极理解和学习国外学界“美学转向”的基础上,充分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和固有的脉络,不能陷入其问题意识、重复其理论探索,而是要重视理论自主性,以中国的艺术史和艺术思想为资源,突破其框架,为“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做出中国的贡献。通俗地说,国内学界不是要为西方学界的“美学转向”提供炮弹,助其挑战主流理论,而是要另辟蹊径,在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上提出自己主张。我一直以为,如果要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的框架下,剪裁拼贴一些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西体中用,可能并无太大意义。从中国自身的脉络出发,循着与科学路径分庭抗礼而又相映成趣的美学路径,也许更易于到达别致的理论高峰。^②

第三,我希望有志于艺术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学人,能够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研究者,也是具有情怀的个体;能够始终抱有一颗研究的初心——如殷之光所言,“最终都能回溯到最初那种对‘人们是怎么感受世界’问题的好奇心上”,探究艺术中所表达的观念对人们“感受与理解世界方法的影响”。^③ 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在其最深处,是国际政治的哲学,是对人类内心的感知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① Ann Sutherland Harris, *Seventeenth-century Art & Architecture*,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5, p. 258.

② 陈玉聃:《诗与思: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视》,《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8期。

③ 法意微访谈:《殷之光:从文学史到国际体系研究,不变的是初心》, http://www.sohu.com/a/132958148_227571, 2018-09-11.